

# 近代中国抵制日货运动的历史困境： 以新闻出版为例

周石峰, 杨棉月

(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1; 贵州师范大学 档案馆, 贵州 贵阳 550001)

**摘 要:**日本纸张既系近代中国的大宗进口商品之一,也是历次抵制日货运动的重要目标。中国机制纸业极其落后,进口替代指数甚低,进口的欧美纸张则价高而量少。抵货期间纸张供给不足导致纸价大幅上扬,甚至酿成“纸荒”。普通民众参与抵制日货运动,既有赖于民族主义作为情感支撑,更须仰仗现代传媒进行深度动员,而新闻媒介又被迫购用日本纸张进行抵货宣传。此种诡异悖反现象,既与抵货运动本旨相悖,又与反日组织难以兼容。有限抵制大大削弱了抵货运动的经济效果与政治效力,并深刻彰显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民族运动的经济困境。民族主义与经济理性如何两全,依然严肃扣问国人的消费选择。

**关键词:**抵制日货;经济困境;日本纸张;新闻出版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4)01-0152-07

1908年,“二辰丸案”引发中国首次抵制日货运动。此后,日人对华侵逼日亟,中日两国冲突频仍,而囿于国力尤其军力不均衡的考量,国人屡以经济抵制作为报复和反抗日本侵略的重要手段,此亦是构成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内容之一。截至抗战初期,抵制日货运动多达十余次,频率之高,中外罕见。晚近,伴随中日关系的每一次紧张,抵制日货的呼声亦不断回响于网络空间。本文以纸张为个案,试图梳理抵货运动对近代中国新闻出版行业造成的巨大困境,进而分析中国纸业的进口替代水平和纸业市场的具体构成,在揭示抵货运动经济约束的同时,也对国人偏离抵货目标的“卖国”之举给予一定程度的同情与理解。

—

日本机器造纸工业始创于1870年,“经之营之……一跃而为世界上之制纸国焉。然彼以蕞尔小国,甚难消费国内产纸之总数,而上等货色,又不得不仰给外国,故中下等之货,极力向我国输出,而我遂为彼之消费场。”<sup>[1]</sup>日本纸业的发展无疑得益于一战期间欧美无暇东顾远东贸易这一契机,1912年日本输出的纸类仅值300余万日元,大战期内逐渐增加,至1918年则已将近3千万日元<sup>[2]88</sup>。1926年日本纸业产额比1912年增加4倍以上,“其所以增加至是之速者,不可谓非欧战之所赐也”<sup>[1]</sup>。我国进口纸类始载于1903年的海关关册,欧战期间英、瑞、德纸渐减,而日纸进口则突增,1931年的日纸进口价值比1912年增加16倍,比1920年也增加3倍以上<sup>[2]88-89</sup>。

因此,1908、1909年抵货运动与输华日纸之间并无紧密关联,而自1919年以后,日纸则成为历次抵货运动的重要目标之一。譬如,1919年6月3日的上海《新闻报》报道称,镇江纸业开会决议

\* 收稿日期:2013-05-30

作者简介:周石峰,历史学博士,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抵制日货运动的历史困境(1908—1945)”(08XZS012),项目负责人:周石峰。

抵制日货,龙章、同孚永等 10 余家纸业字号亦召开全体大会,决定“即日起,不进日货,不用日货,倘有私自图利再进日货者,一经查出,货物销毁,凭公议罚。”<sup>[3]74</sup> 1931 年 9 月 28 日,上海彩印业公会通告:“自今以后,我同业所用一切印刷材料,不准再购用日货……倘甘心违反,当报抗日救国会,严厉制裁,绝不宽假。”<sup>[4]</sup> 无锡车站转运公司决定拒装日货,锡成公司曾委托胜记转运公司将购自上海的数件东洋纸转运至无锡,竟被该公司拒绝<sup>[3]75</sup>,可见抵制日纸绝非纸上空谈。但是,抵制之举造成纸类供给不足、价格上涨等诸多问题,甚至酿成“纸荒”,从而深度冲击中国新闻出版行业。

据马寅初统计,1919 年 5 月的日纸进口数量为 21 097 担,6 月减至 7 956 担,9 月也仅为 7 450 担<sup>[5]475-476</sup>,9 月与 5 月的日纸进口数量相比,跌幅高达 64.69%。日纸进口的减少乃是抵货运动经济效力的重要表现,但此举也同时深刻制约着新闻出版行业的日常运转。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在日记中对五四抵货期间接济同业度过纸荒难关的情形记载甚详:6 月 24 日,“同业要求让售有光纸,鲍先生查复,照现存及本馆所购者恰好相接,难再让。嗣与迪民考究,拟于维昌 7 月中到货 200 件让出 30 件,即告谨怀”。30 日,“同业城内公所同业要求让纸,有几家已经停机。余告仙华、酌量通融”。7 月 31 日,“包文德来言,鸿宾斋来购有光纸,已售与 800 令。余言,已售者不可勿计,但以后拟暂缓。因中华出有告白,本馆拟借售纸以示抵制”。8 月 3 日,“与鲍、包谈售纸与同业,至多只能限 10 件。包意似不足。余力谓不可过多”。4 日,“中华来函,由李柳溪者携来,买有光纸 1 000 令,印刷拒绝”。据其 8 月 6 日统计,抵制日货以后售给同业有光纸 4 830 令、新闻纸 5 250 令,且“所有分馆经手者不在内”<sup>[6]603-625</sup>。小本经营的纸商和出版机构深受抵货运动冲击自不待言,甚至与商务印书馆并驾齐驱的中华书局亦产生原料不足问题,由此则不难窥见抵货运动对出版行业的冲击力。

1928 年抵货期间的纸荒问题亦颇为严重。《顺天时报》曾以“报纸行情突涨,各报馆颇形恐慌,将有无纸印报之虞”为标题,对抵货运动给北平新闻出版业造成的困境进行了宣扬:“据调查,报纸行情,遂即大涨。平时每令价值 4 元 5 角,连日以来,已涨至 5 元 9 角和 6 元之间,至昨日,已涨至 6 元以上,更有肯出 6 元以上之价,尚无处购买。据昨日之调查,北平向发售报纸之敬记、成记、同益各家纸庄,存纸亦属不多,统计各家所存不过 3 百数十令,预计 5 日以后,1 星期以前,北平各报馆,即有无纸印报之虞,报界纸慌将在目前也。昨日午后,报纸市价,有 6 元 3、4 角,突涨至 7 元之谱,各报馆颇形恐慌。”<sup>[7]458</sup> 作为日人所办刊物,其舆论导向无疑是服务于日本的国家利益,但其中所反映的纸荒问题却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早在 11 月 18 日,北京报界即致函反日会,要求通融购用日纸问题<sup>[8]477</sup>。反日会鉴于“没收日货长久搁置,不但毁坏堪处,而损失特大,且有报馆因感纸荒,屡函该会挽救”,故组织拍卖行,“请各报馆到该所购买新闻纸”<sup>[8]478</sup>。12 月 12 日,天津反日会亦以“没收日货,长久搁置,不但毁坏堪虞,损失亦大”为由组织拍卖所,拍卖所没收日纸<sup>[9]</sup>。从拍卖结果来看,此次拍卖售出报纸甚多<sup>①</sup>,而大批油墨、誊写板、自行车等却无人问津<sup>[10]</sup>,可见纸张需求最为急迫。天津反日会为解决天津纸张紧张问题,曾经求助上海总商会调查国产纸张,上海总商会答称“上海尚无报纸出品,浙省报纸厂亦正在筹备时期,出品尚需时日,为救国前途计,获请先行采办瑞典报纸,以供应用”<sup>[11]</sup>。可见在印刷媒介时代,作为造纸术发明者的国度,完全不购用外国纸张已经极其困难。宣传抵货甚力的天津《民国日报》曾经违例购买日纸,而纸张为反日会所扣留。北京警备司令部亦曾在天津订购大宗日纸,以此印刷反日宣传材料,但也被天津反日会所扣,警备司令部为此特派员赴津商洽,反日会以“抵制日货,应由倡导者以身作则”之由断然拒绝<sup>[12]</sup>。1929 年 1 月 10 日,北京反日会查获的日本商品中,即包括糖、纸、香蕉等物数十件<sup>[8]476</sup>。1931 年 11 月 25 日出版的《月华》杂志在其栏目“编辑室谈话”中,明确将其上期延迟出版的原因归结为“因为抵制日货,报纸闹饥荒”<sup>[13]</sup>。

① 文中引文中“报纸”或“新闻纸”,与现时涵义有别,多系印刷报纸所用纸张之旧称,而现代所称“报纸”,民国时期亦有称为“报纸”或“新闻纸”。

诚然,也有部分报馆抵制日货甚为坚决,勉强使用并不适宜的国产土纸。1932年10月6日的《华北日报》以“仇纸泛滥全国之际,四川报界独用国纸”为题,声称:“四川省各地新闻纸,素来兼用仇货及夹江纸,省外新闻业,恒识其粗黄不堪寓目。去年九一八以后,仇货绝迹,新闻全用土产之夹江纸印刷,一般读者,已成习惯。”<sup>[7]497</sup>然而此举终非常态,亦难以持久。30年代初北平出版业所用纸张“概系舶来品,尤以日货价低易销,每年输入数,至为惊人。以舍此别无替代品可用,势将停刊也。市内有初起造纸厂,竭力仿造,质地粗黑,不适用,产量亦微。闻有直接向瑞典、挪威采购者,亦居最少数。现在报纸市价,每令四元四角(曾由三四元涨至七八元),西洋货价格稍高”<sup>[14]74</sup>。而据北平市社会局调查,当地纸市“外国纸品,有大报纸,东西洋皆有,以东洋为多,其牌号有旗牌、墨龙丹凤等十余种。有薄记用之夫式纸,有印书用之道林纸(上海天章造纸厂仿造道林纸,惟出口不多,色略灰白),有名片用之卡片纸,有写铜版用之蜡纸,有吃墨纸,有复写纸,有各色色宣纸牛皮纸毛太纸,有洋宣纸洋粉连纸洋高丽纸,有黄书皮纸灰书皮纸,皆以东洋货为多……惟平市纸业概以贩运推销为本位,而舶来纸品势力尤为伸张。即以大报纸一种而论,市内几有离开洋纸不能营业之势”<sup>[15]249-251</sup>。因此,1932年初北平报界曾经因为使用日纸而与抗日会发生纠纷。“抵货后,平市报纸成大问题。西洋纸非短期间可到,中国纸供不应求,各报万不得已,仍多用日货”,1月3日,抗日会检查发现《事实白话报》使用并存有日纸,遂抓捕编辑何卓然,“置木笼内”,并扣留日纸20件。经军警当局出面协调,抗日会释放何卓然,但未返所扣纸张,同时该会宣称将捣毁北平各报馆。当局派军警分赴各报馆加以保护,而各报馆亦组织“报社大同盟”以求自卫。新闻记者公会连夜推派代表8人面见张学良,陈述事件真相,要求切实保护各报馆。张当即饬令军警当局,立即以严密办法取缔一切轨外行动,藉以维持地方治安。翌日,张学良面示抗日会铁血团,认为新闻纸因无他货替代,应该排除在抵制范围之外,所扣纸张应速返还。同时,记者公会仍然继续交涉。抗日会答应返还所扣日纸<sup>[16]</sup>。苏联《真理报》记者甚至认为,九一八事变后的抵货运动导致上海仓库中积压的日本纸张价值高达250万美元,“日商指望(而且不无根据)国民党的报刊和国民党的出版机构会要这些纸张的”<sup>[17]397</sup>。必须特别指出的是,日方一直强调国民党是抵货运动的支持者。

原料供给严重不足,价格大幅上扬,此乃抵货期间之常态。新闻出版行业或依赖同业接济,或违背抵货规则而购用日纸,甚至遭受木笼囚禁的惩处,行业的生存难境自不待言,而抵制效果亦势必相当有限。下表显示,如果将抵货年份与上年进行比较,其中有三个年份的日纸进口值有所降低,1920年下降41.93%,1922年下降18.50%,1923年降低0.51%。但是,进口值不降反增的年份则更多,1915年抵货运动期间,因为一战而导致西洋纸类的来源几乎断绝,因而日纸进口值反比1914年增加41.00%,而洋纸进口总值则反而下降2.10%。1919年日纸进口值尽管小于洋纸进口总值的涨幅,但仍然高达24.29%。1925年高达42.46%,而洋纸进口总值则下降了5.11%。1927年仅上涨5.14%,但洋纸进口总值则降低8.14%。1928年上涨28.84%,远远高于纸类进口总值14.29%的涨幅。甚至在抵货最为激烈的1931年,也仍然增加8.51%。从日纸进口值与纸类进口总值的变动趋势看,1914年中国进口日纸1500074两,1929年增至13088669两,十余年间增长了8.7倍,1931年则更增加到19877002两,是1914年的13.3倍。而1914年中国进口洋纸的总值为6470768两,1929年为34342655两,仅仅增长5.3倍。日纸进口明显超过纸类总进口的增长速度。从历年日纸进口值与洋纸进口总值的比例来看,尽管一战结束后有所降低,但也多在30%至40%之间。

1914—1931 年中国纸类进口状况比较表(单位:海关两)

年份	进口洋纸	增减百分比	进口日纸	增减百分比	日纸与洋纸百分比
1914	6470768		1500074		23.18
1915 #	6335045	(-)2.10	2115152	(+)41.00	33.39
1916	9528637		3979078		
1917	6249293		4083248		
1918	7243564		4546749		62.77
1919 #	10212652	(+)40.99	5651103	(+)24.29	55.33
1920 #	14159186	(+)38.64	4475666	(-)41.93	31.61
1921 #	15311873	(+)8.14	6352326	(+)41.93	41.49
1922 #	13689258	(-)10.60	5176999	(-)18.50	37.82
1923 #	16626519	(+)21.46	5150611	(-)0.51	30.98
1924	20108678		5406949		26.89
1925 #	19080977	(-)5.11	7702633	(+)42.46	40.37
1926	27668692		9029340		32.63
1927 #	25416384	(-)8.14	9493348	(+)5.14	37.35
1928 #	29048825	(+)14.29	12231423	(+)28.84	42.10
1929		13088669			
1930		18317631			
1931 #	19877002	(+)8.51			

(资料来源:1914—1928 年的洋纸进口数值来自杨端六等编:《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 5 表“入口货总值分类统计表”,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第 4 号,1931 年版;1914—1931 年日纸进口数值来自蔡谦:《近二十年来之中日贸易及其主要商品》附表 4“由日输入货物分品统计表续(1912—1931)”,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有关百分比为笔者计算。标 # 者为抵制日货年份)

此处不拟据此而妄加臧否新闻媒介民族主义情感之有无或强弱,而是进一步分析他们缘何不选择国货和西洋货作为日纸替代品。

二

我国乃系世界纸业发祥地,“考造纸之术,权予于东汉蔡伦,洎乎元季,浸传于法,英、美各国,师吾成法,改用机制,利用木浆,发明填料,而纸之为用大著”<sup>[18]</sup>。随着近代文化教育和新闻传媒的不断发展,中国纸类需求日增,但进口替代则严重不足,惟有依赖进口洋纸,诚如时人所言:“清末门户洞开,欧化东行,纸张一项,遂被倒注,演成洋纸充斥之现象。”<sup>[19]</sup>

我国新式制纸工业发端于清季的上海,但工厂数量少、规模小,所产纸类品种和品质均不敷需求。1925 年抵货运动期间,有人将我国纸张的供需关系喻为“一发”与“全身”:<sup>“进口洋货之大宗,除棉货、纱花、煤油、五金、砂糖、面粉、纸烟等类外,即以纸类进口价值最巨。而上述各大宗物品,大都国内已设厂制造,虽生产力未丰,然尚有成绩可言。假以时日,予以培植,或可发荣滋长,独造纸厂虽有建设,效果殊微。国内所需,悉恃舶来品供应。现计上海、汉口、武昌、重庆、成都、江门、济南等处所有造纸厂,重庆之富川纸厂,系造火柴盒用纸,汉口财政部造纸厂,尚可造新闻纸、印刷用纸及钞票证券用纸张,其余大抵仅能造有光纸或其他洋纸而已,且出品不多,唯上海各厂,尚比较为生产力强者,然因国内印刷出版业发达、商贾营业繁盛之故,各项纸张之需要量骤增,国内产品与需要量相衡,若一发之与全身也。”</sup><sup>[20]</sup>江南制纸公司在其扩充计划中亦曾指出,我国机器造纸厂“合南北各省”不足 10 家,资本总额仅仅 5 百万元,且所产纸张“质粗量少,价复奇昂,殊不足以供应需要”<sup>[18]</sup>。据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 1934 年的调查,资本超过 40 万元以上的造纸厂也仅 11 家,“此等工厂,设备虽不能称为完善,大致尚可敷衍,然以营业成绩不良,非陷于停办状态,即勉强维持现状,其他小规模之造纸工厂,萧条情状,又可想而知矣”。纸类品种主要是竹纸、连史纸、毛边纸、宣纸、高丽纸、表芯纸和方高纸等,而对于需求旺盛的新闻纸、印刷纸、证券纸以及玻璃纸、有光纸等各种

新式纸张,我国所产“为数几微,不得受舶来品之支配”<sup>[21]</sup>。总之,我国每年输入纸张以用于新式印刷为主,而国产纸张仅仅适用于“普通日常书写包裹拭揩”,新式书肆中“举目但见日本货”,纸店及新书店“苟无日本货之支持,将陷于无法营业之境”<sup>[22]</sup>。

不仅如此,中国机造纸工业所需机器和原料亦须仰仗外人。1925年抵货风潮初起时,有人建议仿造洋纸以助抵制而塞漏卮,并向商务印书馆征求意见,但商务印书馆认为原料和机器均无法自给:“查造纸一事,敝公司于五六年前,曾经计划考查,我国虽有种种原料,而欲以机器制造,必须先将原料造成块片纸浆,方可通用。若竹茗草,均可用作原料,但如何化制成浆,我国此时尚无所发明。最高之料,厥为碎布。查各纸厂所用碎布,凡分五等,惟我国之碎布,或使用过久,实已朽烂,或挟来杂物,污秽不堪,以加选择,耗费太巨。故欲与各国第五等之碎布相比,亦且不及,则惟有用极强烈之化学药品,以资溶洗,原有纤维蚀腐殆尽,故造成之纸,毫无弹力。即市上所售洋连纸,即欲作上等包裹之用,而亦有所不能。今世界所通用者,为木类所制之纸,我国东三省境内,所产此类木料甚丰,尽可敷用,然纸厂规模更大,且必须有铁路煤矿与森林毗连,更有极大之水源,以供一切之用,方可着手,我国此时是否有此伟大之资本家。即有此伟大之资本家,东三省此时能否发起此种工业,恐尚是一问题,否则仍须向外国购办原料,而机器及其他一切附属物品,均须仰给于人,恐仍不足以为漏卮之塞也。”<sup>[20]</sup>1932年北平市社会局的调查报告称:“平市纸业概以贩运推销为本位,而舶来纸品势力尤为伸张。即以大报纸一种而论,市内几有离开洋纸不能营业之势。今欲振兴纸业,先在能自造纸方为根本计划。我国南方人士、汲汲集资办新闻纸厂时有所闻。政府提倡造纸工业,亦不遗余力。惟各国造纸之进步一日千里。在18世纪时,造纸仅以破布为主要原料,至19世纪始发明机制木浆。直至今日,可谓洋纸原料完全取诸木材。现更进而用甘蔗渣……日人在台湾创设三友制纸会社亦用甘蔗渣为原料,有每日产额约10吨之设备,出品均属佳良。……我国南方用竹制纸甚早,惟外国现经研究成功之竹浆制法,实异其趣,不去节、不分竹之年龄,其制造最经济、亦最适用。我国若不急起直追,至为可虑。闻济南华兴造纸厂,设备宏大,每日可出报纸四五十令。惜所用原料,仍系旧布及麻袋。亟宜添置新机,改用木材。就已成之局,为改良救济之图,当易为力。无论厂方官方及地方人士,均须极力提倡扶助,俾底于成。庶几能有大量出产,足供华北需要,则非独平市之幸也。”<sup>[15]249-251</sup>马寅初甚至认为国人“未注意于动态的社会,死守成法”乃是中国贫弱之根本原因,他也以造纸为例,认为我国二千余年前即已发明纸张,但“囿于用旧式方法制造,不思改进”,仅能制造普通用纸,而印书纸、票纸以及新闻纸均仰给于外国,每年输入之纸浆即多达2800万海关两<sup>[23]</sup>。更有甚者,中国机造纸工业的创设肇端,亦离不开日方的技术支持。中西合办的华章造纸厂由日人大川平三郎设计一切,华资龙章造纸厂的设计和监督“胥出于日本王子制纸会社堀越寿助之手”<sup>[18]</sup>。

### 三

抵货运动的反对者提出:“抵制日货首先就不要看报了,因为中国报纸均是日本纸”,而运动倡导者则认为:“新闻业者,皆国民先进,必有方法不用日本纸仍办中国报,其他类似报纸的需要而为国货所无者,不妨暂用西洋货,以待国货之产生。”<sup>[24]2</sup>

但是,价格低廉和运输便利正是日纸在中国市场竞争制胜的重要凭借。江南制纸公司工程师张天荣指出,“吾国文化向上,国内纸类之需要又加无已,而国内生产无几,固为一纸类之消费国也。然日本品于制造原价上,比他国品约贵5%,其品质及包装上,较之他国品,亦多逊色,只因日本国内生产过剩,不得已廉价(比他国品廉或同等价)出售”,在他看来,日纸之所以在我国大受欢迎,原因不外三端,即“距离最近,定货后不数日内即可交货;运输便利,到货期确;在中国有多数之洋行或代理店,各为自谋扩张销路,不惜牺牲,廉价拍卖”,因此,他对欧美产品能否取代中国市场上的日纸颇为疑虑:“今后吾国纸类市场,将转而仰给欧美,亦未可知,吾人拭目以观其后。”<sup>[1]</sup>中国银行经济

研究室于1934年亦指出,“洋纸长驱直入,而尤以日本品活动最力。彼日货品质虽较逊于西洋各国,然其价格低廉,为各国所不及,在我国市场,遂摄得牢固之地盘。九一八事变以前,各国洋纸对华输入,日本常居第一二位,沈变以后,中日经济,虽濒绝交,而日本洋纸暗中活动,倾销如故,此虽日商手段之恶劣,实亦我国纸业衰落有以致之。”<sup>[21]</sup>直至1936年,《国际贸易情报》仍将日纸输入我国激增的原因归结为日本拥有交通运输方面的优势:“年来我国新闻及文化事业日趋发达,所需纸类亦日增月盛,而尤以新闻纸用纸之需要最为迫切。日本与我国为最近邻,在运输交通方面,较欧洲便利,所以日本纸之向我国输入亦特多。”<sup>[25]</sup>

或激于民族大义,或为规避风险,部分人士诚有可能选择价格较高的欧美纸张。资本雄厚的商务印书馆则为显例,经理张元济在其日记中记载:1919年10月14日,“翰于会议席上称,存大有光纸无多,不过十日之谱,小有光纸已无存。余谓,此项纸初到时,余即劝包不必急售。现既不敷,只有静候来纸,万不能用东洋纸。”<sup>[6]663</sup>24日,“告翰,宜多备有光纸,即美国纸贵亦可买。”<sup>[6]673</sup>此举并非个例。粤海关税务司费克森在“粤海关民国17年华洋贸易统计报告书”中曾经谈及,由于印务发达,1928年广州纸类进口由上年的137334担增至144541担,而年底日纸完全绝迹于市,“各纸商不得已向别国采办应市,价值虽贵不计也。”<sup>[26]765</sup>纸商不顾西洋纸价昂而敢于购进,成本当然要转至新闻出版业。30年代初的北平,“闻有直接向瑞典、挪威采购者,亦居最少数。现在报纸市价……西洋货价格稍高。”<sup>[14]74</sup>不仅西洋纸价格高于日纸而制约出版业的原料选择,甚至因为“西洋纸非短期间可到,中国纸供不应求,各报万不得已,仍多用日货。”<sup>[16]</sup>

西洋纸不仅价格较昂,而且其输华数量与纸张类型也制约着新闻出版界放弃日纸之后的替代选择。一战前,我国烟草用纸主要来自意大利、法国和瑞士等国,但自欧战以后,这些国家的烟草用纸来源断绝,日本同类纸张输华日见增加,1917年,日本烟草用纸输出总值共计158万余元,输至我国者为41万余元。1918年我国纸类进口共值7243千余两,而进口的日本纸“实占大半”,“此虽欲抵制而事实上有所不能者也”<sup>[27]</sup>。1925年,我国市场上销售的洋纸,“实以英日货占最多数,殆为不可掩之事实”,在北方所销纸类中,“日本几有独占之势”,尽管南方“尚在互争雄长之中”,但1924年上海的新闻纸进口,日居首位,而黄纸板进口,日本竟占84%<sup>[20]</sup>。据蔡谦对1912至1931年中国纸类进口状况的统计,我国在欧战前的进口纸类以来自日本及香港者为最重要,各占进口总值的30%,英、德、瑞纸仅各占10%,而大战后,香港与英纸则一蹶不振。就地域而言,华中进口日纸最多,约占我国进口日纸总值的50%,其中上海每年均占华中进口日纸总值的90%以上。1926年以后,华北日纸进口量突增,平均占全国日纸输入总值的24%,最高时占华北洋纸进口总值的80%以上,最低时亦占53%。东三省日纸进口约占该区洋纸输入总值的70%,英、美、德诸国纸张“远非其敌”,英、美两国纸类销于华北者较少,德纸虽然稍多,然而最高时也仅及日纸价值的四分之一。蔡谦据此认为,数年内输华日纸将“不致有何变动”,因为我国新式制纸工业尚出于萌芽时期,“绝难与日纸竞争”,而英、美等国虽然产纸甚多,但是“自用尚不敷,或无巨大余量可供中国”,而德国、加拿大和瑞典、挪威等国,“余纸虽多,但均就近销于欧美一带,或亦难完全代替在华之日纸也”<sup>[2]88-89</sup>。中国造纸工业落后而逼迫深度依赖日纸,时人对此甚感羞辱:“中部扬子江流域及北部黄河下流,素称我国文化中枢,凡百皆先进,而洋纸之需要,则以自日本之输入者为主,宁不可羞。”<sup>[22]</sup>

近代中国的最大威胁显系日本。囿于对中日国力尤其是军力不均衡的考量,国人屡以抵制日货作为报复和抵制日本侵略的重要手段。抵货运动频繁发生,实已证明此举效力极其有限。日货大量输入中国,本系国人发动抵货运动的逻辑前提,但此亦严重制约抵货效力的充分发挥。正如时人所言,抵制日货不失为一种报复手段,既可惩治日本,且为中国自存之关键所在,但就纸张而言,“国人所用以抵制仇货之传单,其本身即是仇货,盖不大可痛心也?”<sup>[28]</sup>反日宣传竟然被迫采用日本纸张,此种诡异悖反现象,深刻彰显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民族运动不可避免的经济约束问题。实际上,民族主义与经济理性之间的博弈交锋,始终是抵制外货运动的历史实态之一,而在民族主义依

然回响于天地之间的当下,如何兼顾两者关系,不可能不严肃拷问每一个中国人的消费选择。

参考文献:

[1] 张天荣. 日本纸类生产之概况及其在华之势力[J]. 商业月报,1929(1).

[2] 蔡谦. 近二十年来之中日贸易及其主要商品[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3]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等. 五四运动在江苏[Z].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4] 彩印业公会通告[N]. 申报,1931-09-28(10).

[5] 马寅初. 如何提倡中国工商业[G]//马寅初全集:2.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6] 张元济. 张元济日记[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7] 季啸风,等. 中华民国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中文部分):54[G].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8] 天津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等. 《益世报》天津资料点校汇编:1[G].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9] 反日会新闻[N]. 大公报,1928-12-12(5).

[10] 拍卖没收日货[N]. 大公报,1928-12-19(5).

[11] 报纸问题[N]. 大公报,1929-01-13(5).

[12] 北平警备司令部所购日纸不准放行[N]. 大公报,1928-12-06(5).

[13] 编辑室谈话[J]. 月华,1931(32).

[14] 《北京出版史志》编辑部. 北京出版史志:4[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

[15] 孙健. 北京经济史资料(近代北京商业部分)[M].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

[16] 平各报用日纸之纠纷[N]. 申报,1932-01-18(4).

[17] 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等. 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2[G]. 成都: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18] 上海之纸业(1)[J]. 社会月刊,1930(10).

[19] 我国市场上之洋纸[J]. 工商半月刊,1929(12).

[20] 静如. 抵制声中之洋纸需给观[J]. 国闻周报,1925(32).

[21] 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 最近我国造纸工业与洋纸进口状况[J]. 中行月刊,1934(5).

[22] 于余微. 日本纸之生产输出及在中国市场上之地位[J]. 中东经济月刊,1931(6).

[23] 马寅初. 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J]. 银行月刊,1926(8).

[24] 经济救国研究社特刊. 经济救国[J]. 出版地:不详,1931.

[25] 日本纸输入我国激增[J]. 国际贸易情报,1936(19).

[26]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等. 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G].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

[27] 我国输入之日本纸[J]. 银行周报,1919(24).

[28] 张其昀. 论中日两国经济的关系[N]. 大公报,1928-09-15(9).

责任编辑 张颖超

### **Sharing and Difference: Popular Religion in Beijing of the Ming Dynasty**

GAO Shou-xian(125)

The many temples in Beijing of the Ming Dynasty came from different sources with different nature. Among them, some were worshiped by government, some by common people, but this was not the clear demarcation between orthodox and unorthodox worship. In daily life, various religious factors interacted with each other, thus becoming a common religion. This was the popular religion shared by all social strata. The popular religion was reflected in many aspects from national etiquette to daily life. Pray, worship, pilgrimage in festivals at home or some particular religious places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direct, concentrated practice of popular religion. Starting from the mid Ming Dynasty, in order to pilgrimage to the temple, there were more and more association of pilgrims, with increasing scales and more complicated organizations. The popular religion was shared by all social strata, but its interior was not mixed together completely, often showing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classes and social strata.

### **Personal Farming and Civilian Clothing:**

#### **Township Officials' Cultural Attire and Multiple Face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WU Qi MA Jun(136)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value choice and way of life we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diversified. But the social change also brought about widespread anxiety, and the Township Officials' social roles and identities became complicated and uncertain. Therefore, they borrowed the role of other social groups to seek their value. They kept personal farming and civilian clothing, shifted their roles between hermits, officials, gentries, farmers and merchants to seek a perfect identity. Finally, they did not become an absolute recluse, nor did they devote wholeheartedly to the reforming of local affairs, which reflected their confusion and introspection.

### **Boycott of Japanese Goods in Moder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ations**

ZHOU Shi-feng YANG Mian-yue(152)

The huge chunk paper from Japa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goals in the boycott of Japanese goods in modern China. With the less developed manufactured paper in China, import substitution index at that time was very low and the paper imported from Europe and the US was confined to a low quantity and high priced. The shortage of supply led to the sharply higher price of paper, and even led to "paper shortage" during the boycotts. Ordinary people who took part in the boycott of Japanese goods depended not only on the nationalism, but also on the mobilization of modern media. This strange phenomenon, i. e. the boycott-propaganda of the Japanese paper on the media did not match the purpose of boycott movement, and incompatible with the Anti-Japanese-Organization. Finite resistance greatly weakene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effect of boycotts. Therefore, it manifested the economic plight in the national movement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y. It is a hard choice among the citizens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economic rationality.

### **Research on the Assyrian Militaristic Culture**

LI Hai-feng LIU Qi-liang(167)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the Assyrians were a famous nation with a worship of force. The Assyrian Empire forces developed to its peak in the 9th to 7th century BC. The Assyrian army conquered the land from Mediterranean to Persian Gulf, and established the first great empire between Asia and Africa during the Iron Age. The Assyrians' militaristic culture exerted influence on all the aspects of the Assyrian Empire. The spiritual motivation of Assyrian was not only the key factor in establishing such a powerful empire, but also the chief culprit that led to its declining and downfall. Assyrian militaristic culture and a series of conquest largely affected the Near East historic development agenda.